

# 湖南省星级休闲农庄空间表征及影响因素<sup>\*1</sup>

夏赞才 唐月亮 殷章馨 刘婷 陈祖龙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星级休闲农庄作为农业旅游重要衍生项目, 有力支撑着农业观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湖南省 1 008 家星级农庄的识别和定位, 运用数理统计法和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 对其空间表征进行系统分析, 以探究影响星级休闲农庄分布格局的具体因素。研究表明: ①湖南省星级农庄空间分布上主要集聚于地级市、州府的城郊地带, 呈现城镇居民依托型特征, 且集聚强度自东向西逐渐减弱; 星级农庄在时序上的集聚特征具有相似性。②长沙、衡阳、郴州、岳阳和娄底等湘东及湘中地区呈现高度集聚特征, 而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和永州等市域的核密度较低, 整体呈“东高西低”的态势。③各地级市、州星级农庄数量、增量和区域分布均存在较大内在差异性。④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和高速公路密度存在显著正相关; 此外, 星级农庄空间格局呈明显交通趋向性, 社会经济条件对星级农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旅游; 休闲农业; 星级休闲农庄; 旅游圈; 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 (2018) 06 - 0203 - 07

DOI: 10.15957/j.cnki.jjdl.2018.06.025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日益提升, 城镇居民对回归自然、找寻“乡村性”旅游的需求渐趋强烈, 这一现象有效地驱动了乡村经济的稳健提振<sup>[1]</sup>。休闲农业旅游作为城镇居民休闲度假活动的重要环节, 在统筹城乡协同发展以及缓解“三农”问题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而广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与青睐。近年来, 为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快速、高效发展, 各级政府相继颁发若干文件, 其中, 湖南省于 2012 年颁布了两项标准, 明晰了星级农庄建设规范及其评定规则, 有助于优化全省星级农庄管理, 保障乡村旅游经济健康发展, 进而助推湖南旅游产业的系统协调发展。

休闲农庄作为农业旅游活动的重要载体, 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方面均受到诸多关注。国外学者涉及休闲农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场旅游 (Farm Tourism), 其后对农业旅游 (Agricultural Tourism) 和乡村旅游 (Rural Tourism) 也进行了纵深探讨。因囿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感知差异化等主客观因素, 学界对乡村旅游和农业旅游概念的技术性界定尚未达成共识<sup>[2]</sup>。综合而言, 休闲农庄以满足旅游者休闲观光、娱乐体验、主题教育等需求为前提, 依托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 实现以传承文化为目的的新型休闲农业企业。当前, 我国农业旅游仍处于从“农家乐”为主的初级阶段向休闲农庄过渡阶段<sup>[3]</sup>, 承载着完善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 加快“振兴乡村”战略的时代使命。

通过对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旅游相关成果的全面梳理, 可知国内外学者早期主要以概念内涵<sup>[4-5]</sup>、发展战略与模式<sup>[6-7]</sup>等质

<sup>1</sup> 收稿时间: 2017 - 12 - 01; 修回时间: 2018 - 02 - 24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4YBB024)

作者简介: 夏赞才 (1962—), 男, 湖南安化人, 博士,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与区域发展。E-mail: zc\_xia@126.com。

性研究范畴为主要突破点。随着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产业实践的迈进，对该领域的研究逐步转为量化分析，从而在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上得以拓展。在研究内容上：①主观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满意度<sup>[8]</sup>、旅游动机<sup>[9]</sup>、旅游需求<sup>[10]</sup>等方面，分析乡村旅游者对农业旅游的影响。②客观影响因素。从政治因素、社会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等角度，探讨各要素对农业旅游空间布局的影响<sup>[11-13]</sup>。如卢凤萍以南京市休闲农业为例，从居民生活水平、旅游发展水平、农业水平和产业结构4方面，对休闲农业分布影响展开分析<sup>[14]</sup>；吴清等从经济水平、农业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设施、旅游发展、资源禀赋等六方面，对休闲农业空间布局的影响进入深入探讨<sup>[15]</sup>；张奕驰等归纳并探析了南京市郊休闲农业空间表征，以及空间布局影响因素<sup>[16]</sup>。在研究视角上：基于宏观、中观尺度，以农家乐<sup>[17]</sup>、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示范点（区）<sup>[18]</sup>等为立足点，探讨农业旅游空间结构<sup>[19-20]</sup>、农业旅游空间演化特征<sup>[21]</sup>、农业旅游地可达性<sup>[22]</sup>；从微观尺度探讨农业旅游对农村社会公共体系建设、农民收入、农民就业等影响因素<sup>[23-24]</sup>。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着重以地理学视角对农业旅游现状及发展规律展开深入剖析，研究对象多以休闲农业园区、农家乐以及乡村旅游点等为主，而有关城镇居民农业旅游地的星级农庄案例研究较少。湖南省乡村旅游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其面临区域分布不合理、供给不平衡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星级休闲农庄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法和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对其空间表征进行系统阐释，以期探究出影响星级休闲农庄分布格局的具体因素，从而为统筹星级休闲农庄的系统优化管理，确保湖南省乡村旅游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和决策指南。

##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1.1 数据来源

自 2006 年以来，湖南省休闲农业协会每两年评选一次星级农庄，共计先后评选出 1 160 家星级农庄。经多次甄别和复审，截至 2016 年 12 月，最终保留 1 022 家星级农庄头衔。因此，本文选取 2006、2008、2010、2012、2014 和 2016 年 6 个时间断面的湖南省星级农庄数据。湖南省星级农庄数据信息详见表 1。统计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各地级市、州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湖南省旅游局官方网站所公示的数据。湖南省休闲农业协会、湖南省各地级市州农业委员会等相关部门提供星级农庄名单和位置信息。湖南省星级农庄的地理坐标通过百度坐标拾取器获取。

表 1 湖南省 2006—2016 年星级农庄数据说明

评定年份	数量（家）	数据说明	其他
2006	94	缺失 1 家 3 星级农庄数据	
2008	105	无缺失数据，9 家星级农庄升级	
2010	127	缺失 2 家 3 星级农庄数据，8 家星级农庄升级	2009 年复审取消 15 家星级农庄头衔，2011 年 26 家，2013 年 9 家，2015 年 29 家
2012	205	缺失 5 家 3 星级农庄数据，7 家星级农庄升级	
2014	268	缺失 4 家 4 星级农庄数据和 1 家 3 星级农庄数据，16 家星级农庄升级	
2016	361	缺失 1 家 4 星级农庄数据，19 家星级农庄升级	

## 1.2 研究方法

### 1.2.1 最邻近指数法

最邻近指数又称为最邻近距离，是实测平均距离与理论上最邻近点对应的平均距离的比值<sup>[25-27]</sup>，可判定研究对象在空间分布上邻近程度。本文使用 ArcGIS 中空间统计工具，测算出最邻近点对应的欧氏距离以求得平均距离，实测的平均距离则是实际最邻近距离。理论最邻近距离测算公式为：

$$\bar{r}_E = \frac{1}{\sqrt{2n/A}} \quad (1)$$

式中： $A$  代表研究区域面积； $n$  代表研究对象的数量。

最邻近指数公式为：

$$R = \frac{\bar{r}_1}{\bar{r}_E} \quad (2)$$

式中： $\bar{r}_1$  为实际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 $\bar{r}_E$  是理论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当  $R=1$  时，研究对象在空间为随机型分布；当  $R>1$  时，则研究对象为均匀型； $R<1$  时，表明研究对象呈集聚分布。其中，考察结果的可信度已通过  $Z$  值检验。

### 1.2.2 基尼系数

在地理学相关研究中常采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研究对象均衡程度的研判方法，其公式为：

$$Gini = - \sum_{i=1}^n P_i \ln P_i / \ln N \quad (3)$$

式中： $P_i$  是指在第  $i$  个区域内研究对象的数量占总量的比重； $N$  则是研究区域的数量。

$$C = 1 - Gini \quad (4)$$

式中： $C$  为研究对象分布的均匀度。

$Gini$  值是在  $0\sim 1$  之间， $Gini$  的取值与均匀度成反比， $Gini$  值越大，说明均匀度越低，集中程度较高。当  $0 < G < 0.2$  时，表明星级农庄分布呈现绝对平均；当  $0.2 \leq G < 0.3$  时，表明星级农庄分布呈现比较平均；当  $0.3 \leq G < 0.4$  时，表明星级农庄分布呈现相对合理；当  $0.4 \leq G < 0.5$  时，表明星级农庄分布属于差距较大；当  $0.5 \leq G < 1$  时，表明星级农庄分布属于差距悬殊。

---

### 1.2.3 Ripley' s K 函数

由于点状要素易受空间测度尺度的影响，通常利用 Ripley' s  $K$  函数来分析任意尺度下研究对象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而降低测算误差<sup>[28]</sup>。计算公式为：

$$K(d) = A \sum_{i=1}^n \sum_{j=1}^n \frac{W_{ij}(d)}{n^2} \quad (5)$$

式中： $A$  代表研究区域面积； $n$  代表研究对象数量；距离尺度为  $d$ ； $W_{ij}(d)$  是研究对象  $i$  与  $j$  之间距离。

## 2 研究结果

### 2.1 星级农庄分布特征

#### 2.1.1 地级市、州星级农庄空间分布特征

湖南省星级农庄整体呈现典型的非均衡分布特征（图 1）。星级农庄主要分布在岳阳、长沙、衡阳、娄底和郴州等湘东以及湘中地区，其数量分别为 84、145、112、88 和 182 家；湘西地区星级农庄数量稀少，湘西自治州与张家界分别仅有 14 和 34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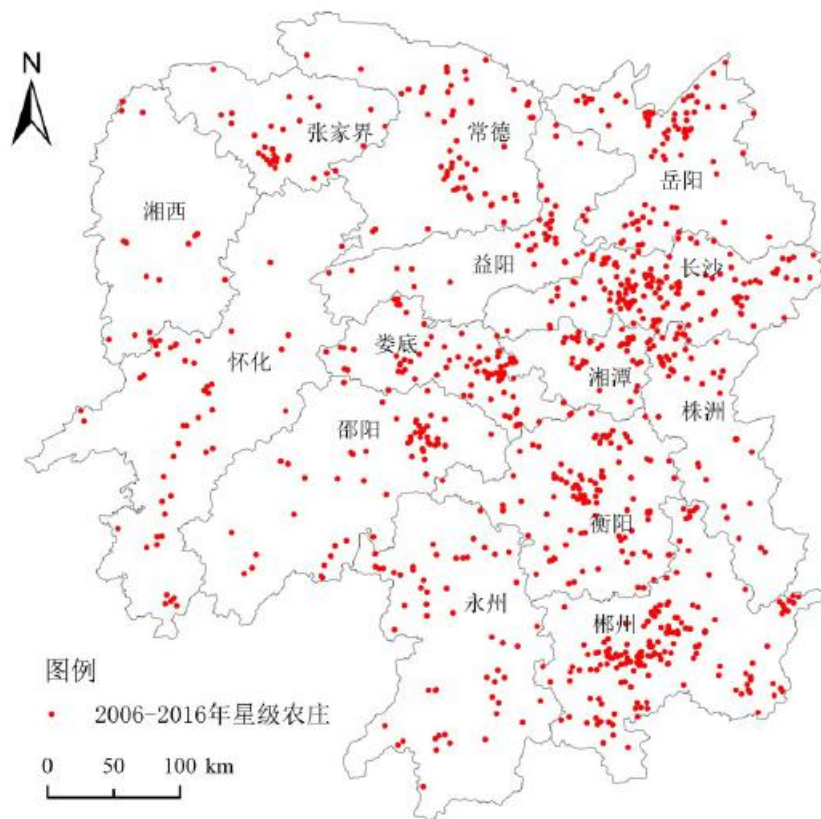


图1 湖南省星级农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tar leisure agricultural manors in Hunan Province

### 2.1.2 星级农庄集中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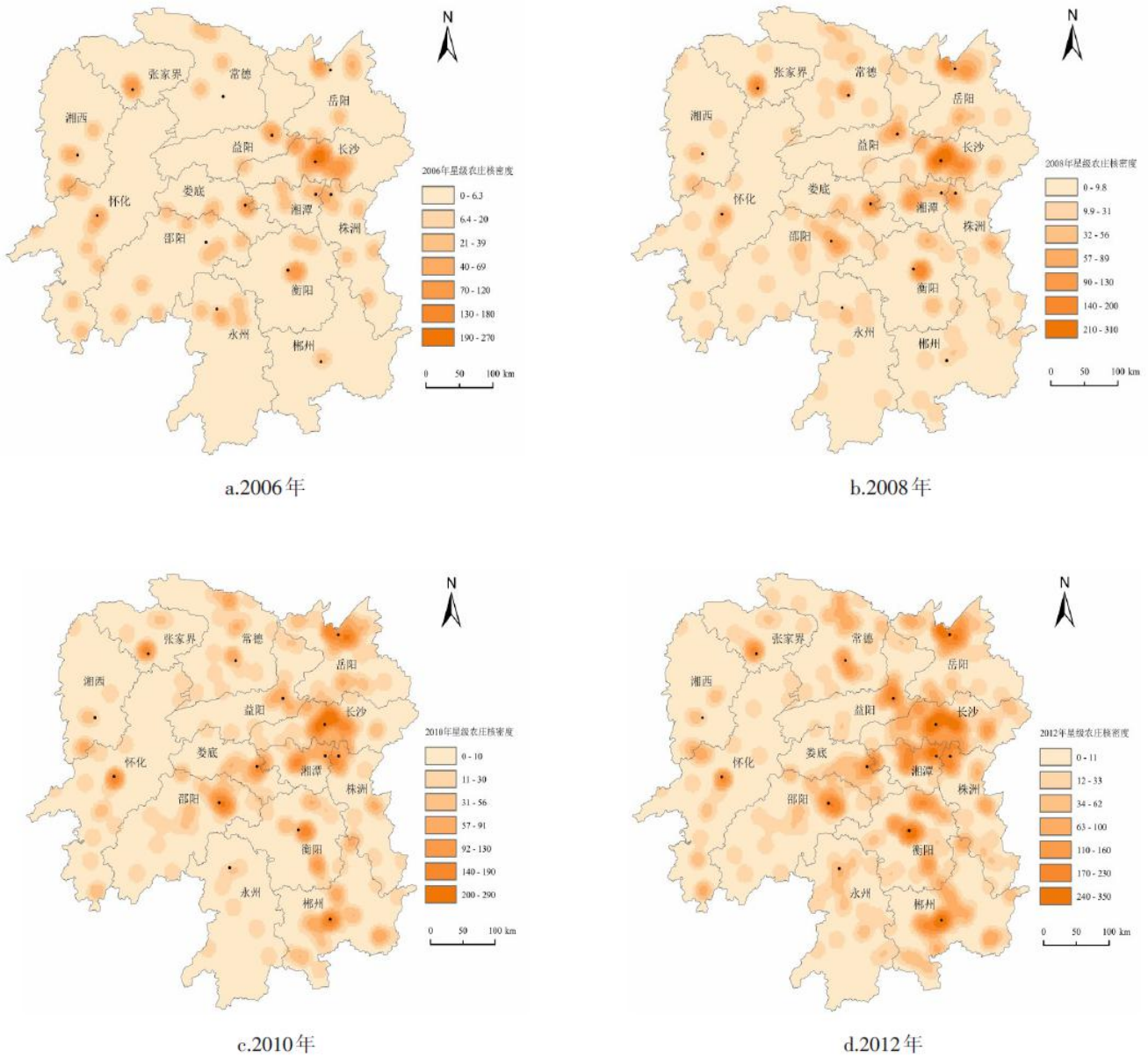
由表2可知，湖南省各年星级农庄基尼系数最低为0.91 ( $G > 0.5$ )，反映出湖南省星级农庄分布均衡性差异偏大，且集中程度较高。不同年份星级农庄在整体上存在一定分异，但基尼系数都大于0.8，分布均匀度都小于0.2，说明集中程度都很高，而2008和2012年星级农庄分布不均衡性更为明显，基尼系数等于0.95，呈现高度集中特征。

表2 湖南省星级农庄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分布均匀度
2006	0.91	0.09
2008	0.95	0.05
2010	0.94	0.06
2012	0.95	0.05
2014	0.93	0.07

### 2.1.3 星级农庄核密度分析

如图 2 所示，星级农庄核密度热点区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高发达的东部区域，且逐年增强，如岳阳、长沙、衡阳、娄底与郴州；核密度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水平及交通发展程度相对较弱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如张家界、湘西州、怀化、邵阳和永州等地区。对不同时间截面的星级农庄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出，各星级农庄核密度热点与冷点空间分布较为相似，其中主要以各地级市、州府的城郊地带为集聚中心，并逐渐向外围辐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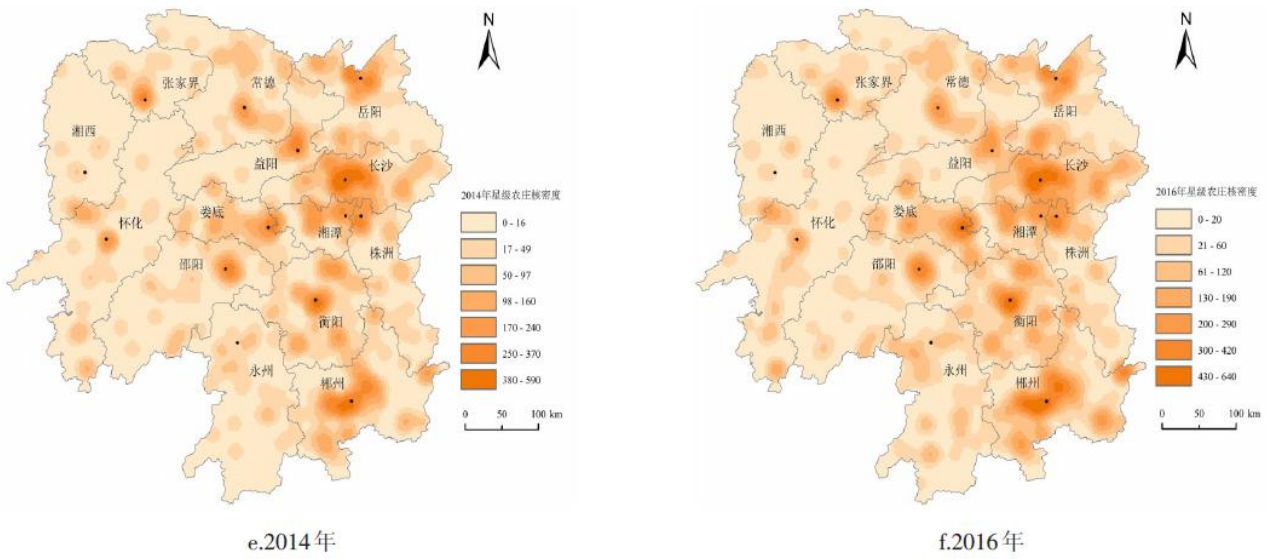


图2 湖南省星级农庄核密度  
Fig.2 Kernel density of Star Agricultural Manors in Hnan Province

#### 2.1.4 星级农庄分布模式

由表3可知，湖南省星级农庄最邻近指数在0.39~0.77之间，Z检验值保持在-37.29~-5.13之间，均表现出显著性，表明星级农庄整体呈现明显集聚分布态势。2006—2008年湖南省星级农庄最邻近指数最高，其后其他时段星级农庄的最邻近指数逐年降低”，星级农庄集聚特征日趋明显，折射出湖南省乡村旅游经济呈现利好发展趋势。

表3 最邻近距离分析结果

年份	星级农庄数量（家）	最邻近指数	空间分布模式	Z 值	P 值
2006	93	0.72	集聚分布	-5.13	0
2006—2008	189	0.77	集聚分布	-6.14	0
2006—2010	291	0.73	集聚分布	-8.93	0
2006—2012	458	0.66	集聚分布	-13.93	0
2006—2014	696	0.41	集聚分布	-29.56	0
2006—2016	1 008	0.39	集聚分布	-37.29	0

#### 2.2 各星级农庄多尺度特征

运用Ripley’s K函数测算不同时间断面，以判别星级农庄在不同尺度范围内聚类程度。当K观测值>K预期值，表明星

级农庄聚类程度较高；当  $K$  观测值  $> HiConfEnv$  值时，说明星级农庄在该距离的空间聚类具有统计显著性；当  $K$  观测值  $< LwConfEnv$  值时，表明星级农庄在该距离尺度下空间离散具有统计显著性。2006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0.45527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研究对象聚类程度最高；2006—2008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0.49888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星级农庄聚类程度最高；2006—2010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0.49411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星级农庄聚类程度最高；2006—2012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0.61348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星级农庄聚类程度最高；2006—2014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2.58033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星级农庄聚类程度最高；2006—2016 年星级农庄预期  $K$  值等于 2.58561 时，观测  $K$  值与预期  $K$  值的差距最大，星级农庄聚类程度最高。

### 3 星级农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通过系统文献梳理发现，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受社会经济条件、区位交通条件、政府行为等因素综合影响<sup>[12, 29]</sup>。鉴于休闲农庄作为休闲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政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交通因素方面展开，运用空间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多视角研判影响湖南省星级农庄空间分布的具体因素。

#### 3.1 政策因素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是统筹城乡协同发展、缓解“三农”问题，推动乡村旅游振兴的重要抓手。2009 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文件中着重指出，需要有效规范和推进农家乐、休闲农庄发展。农业部印发《全国休闲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通知，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农业观光、农业生产、休闲度假等多位一体的休闲农业产业群。此外，2012 年，湖南省发布《关于加快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倡导大力加强对休闲农业庄园、农家乐的规划布局，从税费、用地、财政投入等诸多方面支持休闲农业发展。湖南省各地级市州也出台相关政策，如 2012 年《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和引导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在实行奖励政策等政策制度推动下，郴州市星级农庄数量高速增长。湖南省凭借良好的乡村旅游资源和特色地域文化，吸引着国内游客争相造访，而休闲农业发展方针政策作为星级农庄发展的催化剂和风向标，促进了休闲农庄的高效孵化和快速迭代，成为星级农庄保质增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 3.2 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条件深刻影响地域景观的融合的发展及其空间布局形态<sup>[30]</sup>。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探析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与星级农庄分布的内在关联。基于湖南省区域特点和星级农庄现状，从居民生活水平、农业发展水平、旅游发展水平和区位交通状况四个方面共 6 个指标，采用相关性分析以探析社会经济因素对星级农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郴州市地方扶持力度过大，星级农庄人为性井喷式增长，影响整体样本数据的稳定性，故不予以考虑。结果见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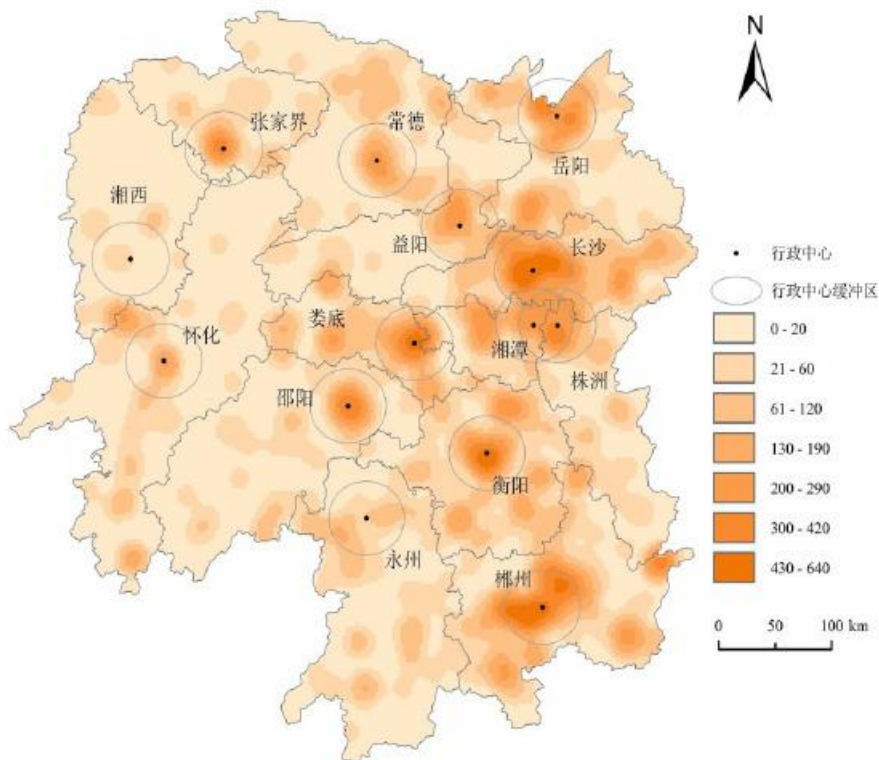
表 4 2016 年湖南省星级农庄数量与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指标	Pearso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居民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619	0.024
	人均 GDP（万元）	0.662	0.014
农业发展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68	0.011
旅游发展水平	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0.75	0.003

	旅游总收入（亿元）	0.699	0.008
区位交通状况	高速公路密度(%)	0.566	0.044

“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和“高速公路密度”分别在0.0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相关系数分别为0.619、0.662、0.680、0.750、0.699、0.566。因而可知，“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经济因素对星级农庄的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可见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星级农庄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内在支撑。

城镇居民作为休闲农庄的主要客源，城镇居民人口基数越大，人均GDP越高，越有利于休闲农庄的稳步发展。相对而言，各地级市、州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因而对各地级市、州人民政府所在地作为圆点进行缓冲分析，半径设定为30 km，分析星级农庄空间分布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图3）。缓冲区内星级农庄456家，占总数的55.16%，表明星级休闲农庄明显向城市集聚，这也验证了黄泰等学者的研究结果<sup>[31]</sup>。



**图3 湖南省2016年星级农庄核密度与行政中心缓冲区关系**  
**Fig.3 The relationship of Star Leisure Agricultural Manors' kernel density and city center's buffer in Hunan Province (2016)**

### 3.3 区位交通因素

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以“快出行，慢旅游”为目标，实现双方互赢的目的。而“快出行”主要通过改善交通状况，降低旅游者的到访时间。由于休闲旅游主要以短途自驾旅游为主，国道和省道对城镇居民影响更大。因此，本文仅探讨湖南省内国道和省道与星级农庄间关系，对湖南省内国道和省道进行 10 km 缓冲区分析，国道和省道缓冲区范围内星级农庄共计 916 家，占总量 90.9%。说明交通便利性对星级农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较为显著，可见交通网络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带动作用明显，促进区域联动性明显增强，为星级农庄的集群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综合应用数理统计法和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对湖南省 2006—2016 年星级农庄空间表征进行系统分析，以探究出星级农庄分布格局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①2006—2016 年，湖南省星级农庄的最邻近指数为 0.39~0.77，都小于 1。在空间分布上主要集聚于地级市、州府的城郊地带，呈现出城镇居民依托型特征，且集聚强度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态势，集聚特征具有相似性。星级农庄作为旅游产业要素的重要构成，区域分布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客观存在。因此科学建构长株潭星级农庄旅游圈、环洞庭湖星级农庄旅游圈、大湘南星级农庄旅游圈和大湘西星级农庄旅游圈大势所趋。加强旅游圈内各市域休闲农业的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同时综合考量各区域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交通系统和市场需求等特征，明确不同旅游圈的特色主题和发展定位，在缩小市域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地方星级农庄的差序化发展。

②湖南东部及中部地区呈现高度集聚特征，而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和永州等市域的核密度较低，整体呈“东高西低”的态势。星级农庄数量、增速和区域分布在不同时间截面上存在较大差异性。大湘西地区作为湖南省全域星级农庄发展的短板，在后续发展中应重点关注和帮扶，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色，依托“田园综合体”创建工程，加快具有地域特点的休闲农庄开发，有效衔接国家旅游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以统筹湖南省星级农庄的协调有序发展。

③2006—2016 年，湖南省星级农庄基尼系数最低为 0.91，均大于 0.5，整体呈现典型的非均衡分布特征。2006 年星级农庄数量相对较少，因而均衡性相对较好。2008、2012 年星级农庄集中程度程度较高。星级休闲农庄既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又深受客流涌入的影响。2008、2012 年湖南省旅游经济整体稳健发展，巨大市场潜力在乡村旅游热潮中得以激发，为助推区域星级农庄发展。其中，长沙和张家界占据星级农庄建设和创收的主体，并加剧了对周边地区的效能辐射和势能带动。

④相关性分析结果在 0.05 显著水平下，“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和“高速公路密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19、0.662、0.68、0.75、0.699、0.566，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各地级市、州缓冲区内星级农庄数量占总数量的 55.16%，揭示出社会经济条件对星级农庄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国道和省道缓冲区内星级农庄数量占总数量的 90.9%，反映出星级农庄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交通趋向性特征。综合考虑各地级市州星级农庄的主客观状况，提出“两点、四带、四圈”的湖南省星级农庄发展格局，即以长沙和张家界为中心点，通过构建京港澳高速、二广高速、长张花高速和沪昆高速 4 条星级农庄旅游带促进湖南省区域内休闲旅游流动、均衡湖南省星级农庄发展布局、打通湖南省周边地区休闲旅游通道，提升乡村旅游的综合接待能力，以满足国民休闲的多样化需求。

### 参考文献：

- [1] 卢小丽，成宇行，王立伟. 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热点——近 20 年文献回顾 [J]. 资源科学, 2014, 36(1): 200-205.
- [2] Phillip S, Hunter C, Blackstock K. A typology for defining agritourism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

31(6): 754 - 758.

[3] 柳百萍, 胡文海, 尹长丰, 等. 有效与困境: 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辨析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5): 81 - 86, 112.

[4] Pulina M, Dettori D G, Paba A. Life cycle of agrotouristic firms in Sardini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5): 1 006 - 1 016.

[5] Clarke J. Marketing structures for farm tourism: beyond the individual provider of rural tourism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99, 7(1): 26 - 47.

[6] Hjalager A. Agri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into tourism [J]. Tourism Management, 1996, 17(2): 103 - 111.

[7] 蔡碧凡. 浙江休闲农业3类典型经营模式比较分析 [J]. 中国农学通报, 2011, 27(26): 311 - 316.

[8] 张蓓. 都市农业旅游满意度与忠诚度实证分析——基于广州农业旅游景点的调查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12): 80 - 92.

[9] 胡小猛, 李淳, 牛家丛, 等. 上海崇明岛农业旅游客源市场特征及未来入岛游客量预测研究 [J]. 旅游科学, 2006(4): 54 - 59.

[10] 单浩杰. 呼和浩特市居民乡村旅游需求的实证研究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29(5): 203 - 208.

[11] 郭焕成. 我国休闲农业发展的意义、态势与前景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0, 31(1): 39 - 42.

[12] 王铁, 郇鹏飞. 山东省国家级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2016, 36(11): 161 - 168.

[13] 王莹, 许晓晓. 社区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子——基于杭州的调研 [J]. 经济地理, 2015, 35(3): 203 - 208.

[14] 卢凤萍. 南京市休闲农业空间差异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11): 231 - 236.

[15] 吴清, 李细归, 张明. 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7, 36(1): 158 - 163.

[16] 张亦弛, 龚劲齐, 赵涔淞. 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南京市郊为例 [J]. 安徽农业科学, 2016, 44(12): 216 - 219.

[17] 刘晓霞, 王兴中, 翟洲燕, 等. 基于城市日常体系理念的农家乐旅游空间功能结构提升研究——以蓝田县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1, 26(5): 138 - 142.

[18] 杨德云. 基于分形理论的全国休闲旅游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结构特征分析 [J]. 改革与战略, 2013, 29(3): 80 - 83.

- 
- [19] 刘真真, 李盈昌. 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景点空间结构的计量地理分析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7): 108- 114.
- [20] 许贤棠, 刘大均. 国家级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5, 35(9): 182 - 188.
- [21] 蔡碧凡, 陶卓民, 张建国, 等. 浙江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征与空间演化 [J]. 经济地理, 2017, 37(5): 181 - 190.
- [22] 李龙, 王朝辉, 李保超.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五星级农家乐空间可达性研究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6, 34(5): 26 - 32.
- [23] Carpio C E, Wohlgenant M K, Boonsaeng T. The demand for agritou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8, 33(2): 254 - 269.
- [24] 郑文兵, 仲笑林.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5, 27(5): 20 - 24.
- [25] Pearce D G, Tan R. The distribution mix for tourism attractions in Rotorua, New Zealand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6, 44(3): 250 - 258.
- [26] 王洪桥, 孟祥君, 孙浩亮, 等. 吉林省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及空间结构分析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2, 26(7): 190 - 194.
- [27] Wang S, He Y, Wang X, Zhu G, Cao W. Regional disparity and convergence of China's inbound tourism economy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1, 21(6): 715 - 722.
- [28] 王士君, 浩飞龙, 姜丽丽. 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区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 2015, 70(6): 893 - 905.
- [29] 苏建军, 孙根年, 赵多平. 交通巨变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及地域类型划分 [J]. 旅游学刊, 2012, 27(6): 41 - 51.
- [30] 王洪桥, 袁家冬, 孟祥君. 东北地区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 2017, 37(6): 895 - 903.
- [31] 黄泰, 席建超, 葛全胜. 长江三角洲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及影响机制 [J]. 资源科学, 2016, 38(11): 2 168 - 2 180.